

长江上游古巴蜀信仰的文化背景

俞伟超

(中国历史博物馆 教授)

长江上游的古代巴蜀文化，在 20 世纪 40 年代被提了出来。至 80 年代后，因广汉三星堆、新津宝墩等古城和长江三峡沿岸的一系列发现，开始进入系统研究的新阶段。巴、蜀两地区曾存在两支并列的考古学文化，可能因源头上有一定的共同性和地缘上的邻近关系，在很长时间内其陶器与铜器有很多相似处，以至可统称为巴蜀文化。可是其最初的族群源头和后来的经济方式却不一样，从而其文化面貌又存在着相当差异；尤其是精神信仰，分属不同类型。从考古学遗存来探索古文化的精神信仰，当然非常艰难，但这却是古文化的灵魂，为更好理解巴、蜀文化，只能闯入迷雾，寻其信仰的奥秘。

一 人类早期信仰的一般情况

全人类在一定阶段时都信仰过某种一神教，而当这种真正的宗教出现以前，又普遍存在原始的巫术信仰。刚脱离动物界的人类，已有了思想，又自感无力，自然会出现求诸神灵的巫术信仰。

人类最早的信仰，按已知现象再作逻辑推理，当包括图腾崇拜。最初的人类为保护自身群体，就实行本群体以外的族外婚。最早的人类，又会觉得自己只是动物界的一员，以为自身是源自某种动物，不同的群体（如氏族）认定了各自的动物祖源。图腾崇拜的原初意义也就是一种祖先崇拜^①。

如果观察 3~1 万年前人类最早的艺术品，可见其题材皆为祈求捕猎顺利和生育繁盛，又知人类最初的信仰还包括了主宰捕猎和生育的神灵。直到新石器时代，人类还因自身力量的微弱，以为万物有灵，崇拜多种神灵。但因不同的生存环境，出现多种经济方式，各族群的信仰也就分化为多种形态。总起来说，则无非是自然神和祖神两大类。其祖神，最初是某种图腾祖先；当父系制确立后，则转化为人格祖神。自然神的内容，则依经济方式和一些其他情况而定。大体是在农业社会中，因农作物是在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就以为决定农作物生长的土地神有重要的地位；并移入人类繁衍的规律，把生长农作物的土地视为母亲，称为地母神；有的地方则还出现农神。当然，实行父系制后，地神有时亦为男性。在渔猎、畜牧、游牧的社会中，则以动物为神的现象很普遍。这种信仰曾延续很久，但当有的族群被其他经济方式的

族群征服后，原有信仰会发生变化，不过其经济方式也必先期或同步变化。经济方式同信仰内容总是存在着相应的主从关系^②。

人类早期信仰的普遍情况，正是理解古代巴蜀文化信仰的基点。

二 成都平原蜀文化兴衰的轨迹

古代蜀文化的分布范围有过不少变动，在其兴盛时期是“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岷（“岷”字据《御览》卷四十“岷冢山”条改）岷。”（《华阳国志·蜀志》）这个范围很广，其中心区域就是成都平原。

在今存史籍中，《尚书·牧誓》称周武王灭商有蜀人加盟，商末之时蜀人当是西南一大力量。有关蜀人的起源过程，蜀汉时谯周的《蜀本纪》^③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等书记了不少传说材料。谯、常皆蜀地人，时距蜀人先世不算太远，经他们选定的这些当地居民世代口传材料，类似当今人类学调查的记录，应当包含着蜀人早期经历的基本过程。

按照这些记录，蜀人始祖蚕丛本居岷江上游^④，而那里是以畜牧为生的氏羌族的活动区域，当为其中的一支。依次为柏灌（或作灌）鱼凫，后者已南至成都平原西北边缘的“湔山”（今茂汶一带）。不久，滇北昭通一带的朱提男子杜宇和梁氏女利又为蜀人王、妃，暗示着那一支居民加入蜀人族群^⑤。昭通之地富产铜、银、锡，有此矿产基地，青铜手工业就能大大发展。杜宇“教民务农”，自称“望帝”，“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华阳国志·蜀志》）。看来原先的畜牧经济转为农业，活动中心到达了成都

平原的彭县一带，所谓“蜀文化”当已真正形式。

杜宇又以治水有功的鳖令开明为相^⑥，后又禅位给开明，号曰“丛帝”，多世相传，皆称开明。九世开明移至成都。战国时蜀与秦战，攻取了陕南汉中之地。蜀又与巴世为战争。至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 316 年），秦因巴人求救之请而灭蜀，开明氏王蜀十二世而亡，子孙流散于川西。但有一支蜀王之子率众三万至越南北部称安阳王，至秦汉之际被南越所灭^⑦。在成都平原，则秦封其子孙为蜀侯，至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 285 年）又诛灭末代蜀侯，只置蜀守。自开明氏亡后，秦国为管理蜀地，当然启用一些蜀人为吏，但蜀人已无自身的政治机构，原有族群自然逐渐解体，慢慢融入两汉时期的、特别是武帝以后新形成的汉人族群之中^⑧。

由此兴衰过程看，蜀人祖源本为川陇间氏羌之一，在其向平原地区移动时，又汇入一支昭通的居民，而至成都盆地定居后，一定还融入当地土著。蚕丛、杜宇的子孙正因以蜀地为根基，所以其文化才被称为蜀文化。蜀文化当含有岷江上游的、滇北的和本地土著的三大文化因素。

但这些有关蜀人早期活动的传说，皆未指明时代。《华阳国志·蜀志》曾曰“周失纲纪，蜀先称王”，似蚕丛等事迹自东周时始；《蜀本纪》则取阴阳术数说，把蚕丛的时代上推到三万数千年前。这两种说法都不可靠，只能从考古发现来推定。

据现有考古发现，成都平原自进入全新世后似长期无人活动，故迄今所见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只是前 3 千纪中叶的。这是近年在新津、都江堰、温江、郫县、崇州和广汉等地见到的一批面积仅为数万至 10 余万平方米的古城和更小的聚落址。陶器多

夹砂粗褐陶，也有灰黑陶等，上有粗细不等的绳纹、菱格纹、戳点纹、波浪纹等，圈足部位或带镂孔，器形以尖底、圜底和花边口沿为特色。有一种灰白陶，则风格迥异。

类似的陶器群，近年在重庆市境内长江沿岸亦被发现^⑨。两地所出，可归为一个文化系统；至于其整体发展过程及其区域类型，因发现不久，当然还来不及弄清楚。但据重庆市忠县哨棚嘴、中坝和奉节老关庙^⑩等地所见，具有自身的发展序列，其哨棚嘴下层要早于成都平原的已知遗存。这就知道巴、蜀两地的新石器遗存，并非分别发生的两大文化。这种文化遗存，东端抵达长江三峡的巫峡地段，与更东的城背溪、大溪、屈家岭、石家河这一文化系列交错为界。这种分布情况，自然会发生两大文化系列的相互影响。

得此认识，就可看出前述灰白陶和圈足部分的镂空作风，不是从夹砂粗褐陶那种文化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而是来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影响。

那种灰白陶的色泽和泥质结构，在屈家岭中、晚期和石家河早、中期的陶器中常见，却不见于其他新石器文化。在圈足上镂孔，也是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的长期传统。还有成都平原诸古城，其城垣主体两侧皆筑出很宽的斜坡，而这又同石家河的筑城技术一样。有此数点，可以推测在 4500 年前左右，约有一支长江中游的居民（或为“三苗”），来到成都盆地。当时，长江中游的文化发展程度要高于蜀地，这就促进了蜀地的文化，兴起了筑城之风^⑪。

成都平原的这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当为蜀文化产生以前的土著文化。蚕丛、柏灌、鱼凫既是来自岷江上游，其文化应有

双耳器发达的特征，但在成都平原这些古城的遗存中，却没有这种踪迹。杜宇一支来自滇北，而也找不出哪一带文化的痕迹。看来，这两支文化此时还没有来到成都平原。

现知最早的蜀文化是广汉三星堆和成都十二桥等遗存^⑫。时代主要相当于商代前后，同宝墩等遗存仅隔半个多世纪，而文化却突然有大进步，应当加入了新的文化因素。

三星堆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灰黑陶为主。从器型看，主要源自上述宝墩等遗存的传统，如尖底杯、小平底罐、小平底盆、小平底盘、圈足盘、高柄豆、簋形豆、豆式灯座形器、鸟头把勺等。有的则是源自夏、商文化，如封口盃。还有少量的鬻，在夏、商的本土已消失，而此时在巴文化区和鄂西地区则很多，当从那里影响而来。

三星堆文化的铜器，则主要来自其他文化的影响。三星堆遗址中出的一种长方形弧角镂孔铜牌饰^⑬，同二里头文化中以松绿石为饰的铜牌非常相似，源头当是夏文化，暗示出此时蜀人已形成并和夏文化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彭县竹瓦街所出商末周初的三角援铜戈^⑭，商文化中少见，陕甘交界地带的西周早期墓中却很多见，那里的氏羌之族在商周之际正是多用三角援戈的。按地望分析，彭县竹瓦街所出当是蜀人遗存，如再联系蚕丛的传说，有理由推测这种形式（甚至包括其他形式）的铜戈，在蜀地出现的原初来源正是岷江上游。三星堆两个埋藏坑的大量铜器和玉石瑞器，时代相当于殷墟期。其铜尊和罍，以及璧、琮、圭、璋等玉器，显然是商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但四棵大铜树和一件大铜人，以及众多的各式人物、兽面形的青铜面具和人头像，以及大量鸟、兽的青铜附饰，则是蜀文化独有的^⑮。后一部分铜器，

如从各种青铜文化的长期传统来观察，商文化中连类似的风格都没有，而滇池周围战国至西汉的铜器却多人物和动物的造型，因而也可以推测这是杜宇那支文化带来影响后新发生出来的。

由此分析，三星堆文化正涵有三大文化的因素。蜀文化发展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时，又陆续出现具有秦（含三晋）、楚风格的铜器，这当和秦、楚的攻战以及楚国西境最后扩大到枳（今涪陵）有关。至汉初，又进一步受到关中等中原地区的影响，到西汉中期以后，作为独立形态的蜀文化，则已消失。蜀文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就是蜀文化的兴衰过程。

三 三星堆文化所见古蜀国的信仰

以三星堆遗存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已以农业经济为主，受到过夏、商文化的许多影响，其信仰、崇拜也会受到同样经济方式的夏、商文化的影响。

当时黄河中、下游的崇拜内容，在三代之时应当是差不多的。故孔子曾曰“殷因于夏礼”^①，周因于殷礼（《论语·学而》），这样，《汉书·郊祀志上》追述西周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的情况，在夏、商亦当如此。不过，三代时最高的崇拜对象是天地。甲骨文中正多对上天之祭。对土地的崇拜，则三代以来一直以社来表示，而社神即地母神是用树为代表物。具体情况是“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论语·八佾》），世界各地地神的代表物各不相同。三代以树为代表，表示出最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已是如此；又因三代王朝曾征服各地，

以树为社神之俗也就遍布各地。在杜宇以前，蜀人还不是农业经济，当然不会崇尚土地神。但三星堆所出物品中，以四棵铜树最为高大，应当是极受重视的崇拜物，而这就是地母神的代表物^⑩。

三代社神是天然大树，但三星堆出的却是大铜树，是否当作社神来祭祀呢？

如为明器，高达数米，不可能放入墓中，只应是真正的崇拜物。从三星堆文化接受商文化的程度来看，三代的社祀制度也会影响到蜀地。西周之时是“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礼记·祭法》）夏、商大概也是如此。蜀人当然可能因其影响而“大社”、“王社”并列，大铜树即置于“王社”之中，后因战争或天然灾难而仓促抛弃在埋藏坑内。

大铜树的树枝上悬挂了许多铜制仿玉之璧。《周礼·春官·大宗伯》谓“以苍璧礼天。”在社树上悬挂玉璧，又表明早期蜀文化是把礼天和祭地放在一起进行。这是不同于三代的特点。

四棵铜树的底部，两棵较小的环坐三人，双手握持某物，皆残破而尚未能修复，所持何物不明。因其衣冠及神情同于另一件高达2米以上的大铜人，可据大铜人所持有之物来推测小铜人所持之物。大铜人所持之物从双手中空部位的形状看，很像是琮（原物已脱落或朽蚀而不存）《周礼·春官·大宗伯》又言“以黄琮礼地”。三个铜人握琮，所示当为正在祭祀地母。这更能证明中间的大铜树是地神。

大铜人立于祭坛上，头戴华冠，身着饰有龙形图案的右衽长服，从双手持琮的情况分析，应为主持祭地活动的大祭司。如从原来大概和大铜树放在一起而亦受崇拜的情况来考虑，则是祭地

之神^{①7}。

在三星堆的全部出土物中，以大铜树和大铜人最为突出，可见在早期蜀文化的信仰中，土地崇拜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大量青铜人面面具和人头像，则反映出祖神占有第二位的重要位置。这些面具和人头像，大概是按在木柱上作为祭祀对象。按其大小、形态和发饰，可分为多种，当即代表多代和多支祖神。

最巨型的一件面具，高 65、宽 138 厘米，远远大于其他面具和人头像，无疑是最重要的祖神。这件面具连同另外两件大面具，双目作柱状突出，和其他所有面具和人头像不一样，必有特殊地位。《华阳国志·蜀志》称蜀之始祖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过去大家都不明白“纵目”之义，自这几件面具出土后，赵殿增即解为是这种突目之状^{①8}。这就可推知这种纵目面具是表示蜀人始祖蚕丛。在各代祖神中，始祖当然地位最高，所以纵目面具做得最大^{①9}。

另有两件同次大的纵目面具大小相若的横目面具，脸形虽同其他面具和人头像类似，但从其尺寸看，在蜀人的祖先中，当占有次要的地位^{②0}。按诸前述传说，疑为象征柏灌或鱼凫。

人头像有 54 件，其发式、冠形或有无面罩，有多种形式。有的是束发于冠内^{②1}，有的辫发垂脑后^{②2}，有的辫发盘于头顶^{②3}。大别之为束发和编发两类。史称羌人“被发”（《后汉书·西羌传》）蜀人则椎髻《全汉文》五三《蜀王本纪》）西南夷中的夜郎、滇、邛都等族亦为“椎结”，更西的则为“编发”（《汉书·西南夷传》）。蚕丛、柏灌、鱼凫来自氏羌之地，其族原来当为“被发”，可是后来则变为“椎髻”。杜宇来自朱提，按其地望，

应在“椎结”区域内，可能蜀人变为椎髻从此开始。5件最大的面具皆未铸出发型，如有发型，也许就是“被发”。人头像中束发于冠的，很可能为“椎结”，大概属于杜宇之后的蜀人。这种人头像中，偶有戴黄金面罩的，身份应当很高，或许就是象征杜宇。第一世开明为鳖令，鳖县即今遵义之地，在夜郎东北很远，即使从传说以为开明为楚人，至蜀地后当亦从蜀俗，故开明氏一族的祖神，也应是束发于冠的人头像。另一些辫发的人头像，当是表现西南夷的西部诸族，能否当作还有一支来自那里的祖神来看待，疑莫能明。

把地神和祖神推定以后，按照青铜时代农业社会的一般信仰情况来考虑，应当还有许多山川之神。三星堆所出一件玉璋上，有一幅细线刻出的祭山图，四排巫师，四排神山，是祭山场面^{②4}。还有许多铜器也与祭祀活动有关，可惜具体内容尚难推定。至于那些尊、罍等礼器，则可用于多种祭祀。

总起来看，这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青铜文化，其信仰内容正包括了地神或天地之神、祖神和包括着山川河泽的多种自然神。

四 三峡地区及嘉陵江流域巴文化兴衰的轨迹

巴人早期以渔猎为生，起源于鄂西的清江流域，又沿着长江向上游发展，并到达嘉陵江流域和汉中等地。在这一大片范围内的巴人，实际存在着东、西（巴东和巴西）即南、北（长江三峡和嘉陵江流域）两大支。

史称廪君蛮起于武落钟离山，即今之长阳清江流域，有巴、樊、鄱、相、郑五氏，以巴氏为帅。当向长江三峡一带进展时，

传称廩君曾射杀盐神。三峡地带多盐井，盛产井盐，这一传说暗示廩君蛮曾以武力夺取这片地方。巴氏又称廩君的魂魄世代为白虎，说明是以白虎为图腾祖先。当巴人到达嘉陵江流域而形成两大支后，其界限是很难分清的。大体讲，长江沿岸主要是这五氏巴人，东汉以后曾向荆、湘等地散布，故《后汉书》归为“巴郡、南郡蛮”。唐宋后南方地区的僚人，即其后裔。

以嘉陵江流域为中心的巴人有罗、朴、咎、鄂、度、夕、龚七大姓，汉时称板楯蛮或賸人。相传秦昭襄王时有白虎率群虎为害，阆中巴夷射杀白虎，平定虎害，秦国免其租算，故汉时又称为白虎复夷。长江三峡一带的五氏巴人以白虎为祖，而这七姓巴人却以射虎为业，必非一支。但这支巴人直到十六国时的李特一氏，还称为“廩君苗裔”（《晋书·李特载记》）好像分化是后来发生的。在嘉陵江上游至汉中一带，本多氏人，巴人来到这里后，与氏人及当地其他族群长期共处，故巴人七姓血统很杂，而至魏晋以后，又习称为巴氏。地理区域和血缘上后来发生的相异，是分为两大支的原因。

嘉陵江流域的巴人，天性劲勇，俗喜歌舞，周武王伐纣时即用为前锋，并以作战时的“前歌后舞”（《白虎通·礼乐篇》引《尚书》）而传称后世。刘邦自汉中出兵征服三秦时，亦为前锋，因见其歌舞即武王伐纣之歌，下令乐人习而传之，成为后来广泛流行的“巴渝舞”。史称巴人勇猛和能歌善舞，是指这支巴人而

周人克商后，封“宗姬”为巴子。巴与楚婚，楚共王正妃为“巴姬”（《左传·昭公十三年》）楚灵王妃亦为“巴姬”（《路史·国名记》），巴曾为姬姓封国是没有问题的。春秋时巴子已为楚的

附庸，但楚国曾为巴师的武力而吃惊。巴人又曾伐申、伐庸、伐楚，巴的东界一定到达长江北岸楚境之西。至战国时，则楚国逐渐沿江西侵而至于枳（今涪陵），巴的中心只能退到江州（今巴县）^②。不久后，秦国灭蜀、灭巴（前 316 年），随即攻占楚的郢都（前 278 年）这一带悉为秦地^③。但秦国对巴、蜀的政策完全不同。蜀国早已农业立国，秦国即在那里实行郡县制。巴则虽为西周封国，但大部分地域还是渔猎经济，多为大姓渠帅掌领的部落，实际并未统为一国，所以秦灭巴后，仍依其旧制，由原有大姓渠帅，统领各姓，实行管辖。这样，自重庆以下的长江三峡一带，巴人的生产、生活原貌，基本未变，涪陵小田溪发现的秦灭巴国以后的巴人贵族墓地^④，就依然埋在以前形成的所谓巴人先王陵墓区内。

两汉时期长江三峡和嘉陵江流域及汉中等地的巴人，原有的族姓关系仍很严密，但又加了新设县廷的管理，故汉化速度，已大大加快，其大姓出任官吏的也愈来愈多。这尤以嘉陵江流域至汉中一带为甚，以至汉末从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移至汉中，并再移至甘肃东南部的李虎一族，至十六国时又流归四川建立成汉之国达 42 年。经南北朝后，北支巴人逐渐消失；南支巴人则不绝如缕。今湖北、湖南、重庆接壤地带的土家族，大约即为巴人之裔。

据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在宜昌至重庆之间的长江两岸，包括清江流域，已可把早期的巴文化上推至夏、商之际，而至二里岗上层期后，则遗址增多。其陶器和三星堆文化的很相似，皆为手制，灰黑陶和红褐陶都有。流行鬲和封口盂，但鬲比蜀文化要多。也有尖底或小平底的孟、小罐、杯、灯座形器

等，但蜀文化多大侈沿长腹罐而巴文化多高领微侈沿中腹罐；蜀文化多鸟头把勺而巴文化多羊角杯；等等。石器多磨制精致的小型斧、锛、凿等木工工具；铜器多鱼钩等小型渔具。这种遗址如包括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在内，在此地段内已找到百余处，大多为沿江的小遗址，颇似可经常移动的小渔村。

但也有一些大型遗址。例如巫山大宁河畔的双堰塘，面积几乎近 10 万平方米。下游数公里处的河滩旁还出过饕餮纹铜尊，风格极似三星堆出的。上游 10 多公里处又出过 10 多枚铜锭，从铸锭尺寸看，时代不会和铜尊差得太远。这表明早期巴人的青铜手工业也达到相当水平。

又如忠县 谿井沟一带的巴人遗址密集，遗存堆积时间长久。其中坝遗址，文化层竟达 10 多米，从商代前后到战国，乃至汉代，看不出有很多间断。附近的瓦渣地遗址为烧陶区，烧废之器堆积如小丘，而且器形单一，当是专门烧制某些陶器的地点。如联系廩君时即曾用武力争得这一带制盐业的传说来考虑，此时巴人的生产专业化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换程度，当已属于文明时代的范畴。

再如云阳李家坝、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等地所见战国至汉初的巴人墓，几乎普遍有巴式的青铜剑、戈、钺、矛等武器随葬，反映出一种既为鱼猎之民、亦为战士的全民皆兵的状况。这很能说明当时巴人的社会面貌。

但涪陵小田溪战国末或秦代巴人首领（或即巴王）墓中所出十四件成套的编钟（八件有错金纹饰）^⑧，既表现出此时巴人已模仿中原的宗庙之乐，又说明其首领比一般成员占有更多财富的情况，还是很突出的。

应当说明的是，巴、蜀两地的兵器是一样的，作为巴、蜀文化乐器特点的青铜鐏于和钲，也是一样的^②。不过鐏于在巴文化中要延续到汉代。

表现巴、蜀文化自身征最强烈的是图语式符号与成行的文字。图语式符号多见于兵器、乐器及玺印上；成行的文字则仅在兵器上偶见^③。这些符号和文字，现知只存在于战国至汉初，还都不认识，好像刚产生不久即行消亡。这当然同汉化加速有关。

但这并不意味着巴文化很快将完全消失。直到今天，土家族的跳丧舞和吊脚楼以及其他民俗，还存有古代的巴渝舞和巴人干栏式建筑的一些遗痕。汉以后巴文化面貌的递变过程，在以后的仔细寻找中，一定还能看到一部分。

五 三峡地区巴文化中的白虎崇拜

以渔猎为生的巴人，同实行农业经济的蜀人不一样，不以土地神为重，而且还停留在图腾祖先崇拜的阶段。

此如《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所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子务相能力特异，四氏）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但嘉陵江流域的巴人则又以射杀白虎为业，故《巴郡南郡蛮传》又曰：“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汉末灵帝时）汉中上计程包对曰：‘板楯七姓 射杀白虎 立功先世 复为义人。’^④”这清楚说明是阆中的

板楯七姓，射杀白虎，而《华阳国志·巴志》则作“夷胸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指为三峡地段今云阳之地的巴人所杀。

任乃强以为三峡一带的廪君五氏以白虎为祖，而嘉陵江的板楯七姓则“专以射白虎为事”（《巴志》）所以是“对立之两种民族”，一为巴族遗裔，一为忠于秦的賁民即板楯蛮^②。但图腾制很复杂，多数是禁杀、禁食本族图腾，而有的却允许食用。

比如玻利尼西亚的提克皮亚人（Tikopia），有四个部落以白薯、椰子、野芋、面包果为图腾，但却把这四种植物当作主要食物^③。以白虎为图腾祖先的族群，不见得必定要禁杀白虎，况且所谓白虎，只是隐喻虎神。有无射杀白虎的隐喻，可以暗示出三峡的廪君五氏和嘉陵江的七姓板楯是巴人中的两大族群；但射杀白虎既是一种历史的光荣，后来三峡一带的巴人拿自身来比附也是很可能的。看来，曾经并存过两种说法，而范晔及常璩则各取其一。

如把白虎视为虎神，那么，巴文化的遗存中有无具体表现呢？

有！这就是战国至两汉时多见的虎形图像。

最多见的是战国至汉初巴人青铜兵器上的，尤其是柳叶形剑上的一种侧形虎纹。有的剑虽无虎纹，剑身作出的斑点纹亦曾被称为虎斑纹^④。在不少兵器上，则只铸出虎头形。

还有是长江沿岸秭归、涪陵等地两汉时期墓中的虎形铜带钩^⑤。这是它地不见的，当亦是巴人崇拜虎神的一种表现。

最突出的是青铜錡于上的虎纽，《周礼》曾笼统说錡于是出军时所用。现知最早的錡于出自江苏镇江王家山的春秋晚期吴国

贵族墓中^⑥，上亦有小虎纽。鐎于既是军中乐器，虎纽当即象征勇如猛虎的战神。由此启示，可推知巴人武器上的虎形图案，大概也是战神。

在巴文化中，鐎于至战国时才有，也许是受吴越文化影响后才出现的，并一直延续到东汉，甚至更晚一些^⑦。巴人的这种鐎于，常常单独出土，颇似汉以后百越文化中铜鼓的出土情况。按照当代人类学的调查，这种铜鼓是祭祀、丰收以及其他许多公共活动中的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乐器。如果鐎于的用途类似，则虎神将是一种具有主宰多方事物威力的伟大神灵。

巴人的这种虎神，如同射杀白虎之说有关，正为表示捕猎和战争中的勇猛无比，其性质同一般意义上的战神没有多大差别。春秋晚期吴国鐎于和战国至汉初巴人兵器及鐎于上的虎神，应当就是这种战神；顶多是巴文化中东汉鐎于上的虎神，也许已是地位更高的神灵，但现有材料并不能肯定不再是战神。

所谓廪君魂魄世代为白虎的说法，当指图腾祖先。图腾祖先不会见于经常使用的兵器或器皿上，而应出现在更为神圣的场合中，鐎于虽然可能在这种场合上出现，但其虎纽的形态早晚差别不大，难以看出从战神到图腾祖先的变化。作为图腾祖先的白虎，迄今尚未能在巴文化中找到。

需再作说明的是，带有这些虎形图纹的兵器和乐器，巴、蜀两地都有，而且只流行于战国至汉初，更早的迄今未见。这就应理解为崇拜这种虎神并非巴人特有信仰，而且要晚到战国才出现。可见这绝非表示“魂魄世为白虎”的图腾祖先，而应同射杀白虎那种传说的出现有关。作为战神来看待，就可以拉开同族源的关系，因而巴蜀两地可以共同信奉。从这种信奉情况看，巴人

与蜀人精神信仰的接近程度，远远超出了仅从文献记载中得到的认识。

但作为图腾祖先的白虎崇拜在巴文化中肯定是存在的，因为其遗痕甚至一直保留至今。现在巴东、建始、利川等县的土家族家庭，往往还供奉白虎，祭祀雕刻木虎，使用白虎门神；有的门楣、柱础、墓碑或家具上，也常雕出白虎形象^④。像这些遗痕，特别是供奉和祭祀使用的，肯定具有图腾祖先的意义。

六 东汉中期以后巴蜀地区神仙信仰的发达

在巴蜀地区，蜀文化早已开始汉化；巴文化至西汉中期后，也日益加速汉化。就其信仰而言，原先那种原始巫术信仰，则渐变为道教范畴的神仙信仰。

就整个汉代来说，至西汉晚期，在当时盛行的讖纬学说的基础上，太平道在齐地形成。自东汉顺帝时起，太平道在黄河中、下游广为传布，关中有骆曜所传缅甸法道，蜀中则流行张陵所创五斗米道即天师道。其后，张陵子张衡、张衡子张鲁，皆传五斗米道，并向汉中一带传播。汉末黄巾起义后，天下混乱，张鲁占有汉中，那里实际已成为居民全都信奉五斗米道的政教合一的教区。从嘉陵江畔的阆中至汉中，正是賡民即板楯蛮的聚居区，賡民几乎都信奉五斗米道。在这种信仰背景中，巴文化中神仙思想的发达，必是日益加甚。就当时整个道教信仰的内容说，又和佛教信仰和西王母等民间信仰交杂在一起。西王母信仰的发源地，即为巴蜀地区，故东汉中期以后这里的西王母图像，到处都会出现。近年巫山的高唐观、南陵、东井坎等地东汉后期墓中出土的